

地方文化系统中的关帝信仰

——山西解州关帝庙庙会及关帝信仰调查研究

闫爱萍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太原 030006)

摘要:民间信仰中影响重大的关公信仰,在关帝故里是由国家与当地社会双向影响和共同建构的民俗事象。在这个过程中,不论是关帝故里还是关公信仰,都是由地方多重话语来解释的,体现了社会不同主体之间交往实践的过程。关帝信仰在一个地方传承的生命力,在于它不仅与地方社会生活,而且与这个地方社会拥有的其它各方面历史传统文化结成了可以“互释”的密切关系。也就是说,只有发生“在地化”的关公信仰,才能使关公信仰得以普遍流行。

关键词:关公信仰;解州镇;地方文化系统

中图分类号:K291/2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57(2010)02-0068-05

关公信仰在中国民间信仰中占有重要地位,可谓深入人心,源远流长,因此成为学界关注的对象。早在20世纪20年代国外学者就对此开始研究,解放以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国内很多学者对关帝信仰进行了生成与演化历史的研究,且成果累累。但以往的研究多局限于文献文本和关公信仰的宏观描述,缺乏对于这一活态信仰文化的具体描述和研究。因之,各种书面文本上几乎看不到有关现当代关公信仰的民俗志记录。那么,对于“关帝”这个神灵符号怎样深刻影响民众生活,在这种信仰的民间运作中,各个信仰群体所发挥的作用有何不同,对问题的解决,需要我们进行田野调查。

另外,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民间信仰的基本结构与程式是一致的,就民俗信仰研究的情况看,如果稍稍深入到不同区域的民众生活中,就会发现这种超地方化的事象和结论完全是靠不住的。而在另外一些学者看来,以中国之地大物博,不同取向的亚文化彼此之间关系不大甚至没有关系。然而各地的关帝信仰事象的雷同显然不是偶然的,明显的类型化和一致性明示着它们之间有着某种程度的关联。那

么,现当代中国的关帝信仰究竟是什么样的状况?具体到“关帝故里”,地方化关帝信仰的状况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形态?这也需要开展田野调查。为此,笔者于2008年5月12—18日赴解州镇就关帝庙“四月初八庙会”的情况作了实地调研,下面结合文献记载对相同事象作一分析。

一、解州关帝庙的历史记载

解州关帝庙位于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解州镇西关,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当地民众引以为豪的人文景观。据《解州全志》记载,关圣庙在城西门外,南面条山,北负硝池,创自陈、隋,宋大中祥符间重修。关帝庙现存碑碣中记有创建年代的三则碑记亦沿此说。自宋代至民国时期,关帝庙屡有增建修葺,先后共达30余次。明代解州关帝庙格局已逐渐完备,规模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清代关帝庙虽屡遭劫难,所幸朝廷和地方官员不断进行重建和修葺,才使得大部分建筑得以保存。

就关帝庙早期的民间信仰而言,完全的历史真实已不可能复现,只能借助于书面文本。明清以来

收稿日期:2009-06-08

作者简介:闫爱萍(1975—),女,山西忻州人,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师,法学博士。

文人歌咏关帝庙与关帝故事的诗文连篇累牍,上下层文化向来是在互动语境中运作的,这些文人的描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上下层民众关于关帝庙及关帝信仰的事实。如明张四维《重建解庙记》中记载了“庙祀遍天下,而唯解之崇宁庙者,规制尤伟。灵应均之,盖其所生地然也”。说明在此之前关帝庙在当地已经有了一定的影响。“人们对神的尊重,往往通过修葺寺庙或将庙的内部装修一新来表示。装饰神像和整修寺庙是社区的大事,通常都会在碑文上留下对神化英雄的歌颂赞美之辞以及描述神明保护一方的神话故事,这种方式有助于社群对神化英雄的纪念。”[1](P162)关帝庙现存清同治九年的一块布施碑,记录了从清咸丰九年(1859年)开始,关帝庙所进行的一系列维修、重建工程,至同治九年(1870年)结束,历时11年。此次工程,工多费钜,上动库款,下及商民,尚有众多官府人员参与其中。这个碑刻涉及布施者664人,商业组织约700家,另有93个村庄。这使我们能更具体、更形象地把握到“关公”的影响,认识到“关公信仰”在民间深厚的信仰基础。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寺庙是以神灵崇拜为中心而营建起来的宗教场所,寺庙与民众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往往是现在的人们难以想象的。[2](P51)实际上,当我们检索地方志中地图时,会发现除了衙署之外,标识最多、最醒目的就是本地的各个寺庙。同样,我们检索山西省各个地区的地方志发现,关帝庙不仅数量是最多的,而且城内的关帝庙位置也是最突出的,一般都靠近衙署。至于广泛分布在村落中的关帝庙,正如明恩溥称,在华北地区最常见的庙宇就是关帝庙和土地庙。[3](P103)这种情况表明,一方面与官方的推崇有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对于广大民众来说,关公信仰得到了民众的认同,关帝庙则构成了他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在调查中对于这种现象深有体会。关帝庙的建筑几度兴废,但关公信仰活动却年复一年地传承下来。改革开放以后,在官方的支持下,庙会的规模一度扩大。从2006年起,关帝庙的文管所联合解州的各界人士举办了大型的“关帝巡城”活动。

二、关帝庙庙会的形式与兴盛原因

解州关帝庙会是中国所有关帝庙中最早形成庙会的,迄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在沟通晋、秦、豫三省的经济、文化交流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隋唐时期就有了雏形,起因是朝野各地的官员、百姓纷纷慕名前来朝拜、祭祀,小商贩也从四面八方赶来做

生意,客栈、酒店应运而生。但因秦汉以来,解盐官营,不能参加商品交流,客观上遏制了解州庙会的发展。到了唐末五代之际,社会动荡不安,战乱纷纷,交通中断,盐禁松弛。后汉高祖刘知远利用解池所产的盐换取军队所需的马匹,以维持其统治,直至乾佑元年(948年)设立解州,庙会由州府确定了具体时日,从此,豫西、鄂北的马帮,甘肃、内蒙的骆驼,苏杭的绸缎,陕甘的马匹等源源不断涌入解州。

解州为关公故里,乡人奉祀,盛于他地。地方相传,四月初八为关公受封之日,六月二十四为诞辰,九月十三为忌辰,三日均无明确的历史记载,但相沿成习。三日中以四月初八最受地方重视,尤其是在朝廷没有核定春秋二祀之前,更是如此。庙会根据农时季节定为农历四月和九月一年两次,会期各为一个月,四月初八和九月初九为会圆日,即当地老百姓说的“正日子”。全国各地较远的客商为了赶赴庙会,一般都是在正月初五团圆饭一吃便驾车起程,奔赴解州。新疆、西藏、广西、云贵客商更是如此,届时,解州城内的大街小巷住满了异地商人,卖艺的、戏班子、杂耍、赌场十分活跃。

从20世纪80年代后,伴随着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关帝庙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90年代以后,庙会的会期不断缩减,从半个月,十天,七天到现在一般就是进行三天,而且主要就是初八这一天,来进香和游玩的人比较集中。逛庙会的大多是县城居民、商人、农民,偶尔还有外来的打工者、军人等。除了解州镇本地人外,还有不少临近县如永济、临猗、芮城、夏县的香客,个别还有来自台湾、澳门、福建、西安的游客。

从调查看,关帝庙会会出现大规模复兴的现象,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民众传统信仰的行为惯制。民间普遍认为关帝庙会已经有千百年的历史,他们的老祖先们一代代都是在四月初八给关老爷烧香,而老年人更是相信关老爷作为解州人,保佑了他们的祖祖辈辈并且还将继续保佑他们。如果他们不遵循这样的传统,既违背了祖先的老规矩,又失敬于关老爷,就会遭到神灵的惩罚,所以必须要来给关老爷烧一柱香,祈求关老爷保佑。在香客队伍中,看到年轻人陪着老年人来烧香的,年轻人的回答往往是:“老人要来,我们就陪着来了。”许多接受过现代教育的年轻人虽然对关老爷的信仰不那么虔诚或根本就不信,但中国民众普遍有从众心理,在随大流的思想支配下,也不得不来烧香讨个平安吉利。他们来关帝庙的目的是半进香半游玩,焚香跪拜的神情也比较随

便。很多远道的、附近的做生意的人是最积极的香客，他们往往早早就到了庙里，每个人都想烧头柱香，而且这些人平常的初一、十五都要来庙里烧香。另外还有连年考不上大学或即将考学的学生，在工作中不顺利或者下岗的职工干部，家里有什么不如意的事情的老百姓。这部分人选择庙会的正日子来给关老爷上香，是因为他们认为这天是一直传下来的敬神的好日子，这天求神比平日里要灵验得多。其他的祈求行为也是如此。

根据香客出现的时间和服饰，一眼可以看出关帝庙的香客大体上可分为三类。穿着整齐新鲜的是运城市及附近县城的居民，这些人都是开车过来的，来的时间也比较早，早上8:00庙门一开就去烧香，当地人都有“抢头香”的习惯。据说抢得头香的人，这一年内都有好运气。这些人基本上自己带车来，所以烧完香不到10:00就离开了。第二是附近和周边各个村的农民香客。因为家比较远，有的甚至在七八十公里以外，交通又不是很方便，所以早早就得搭公交车来。调查中遇到一群从芮城赶过来的香客，她们都是一个村的，提前约好了合租村里的一辆车，早上6:00就起床了，路上用了一个多小时，不到8:00就到了。这些人不是很富裕，但表现的更为虔诚。她们本村里也有关帝庙，据她们讲，初八这天来解州的关帝庙，明天就到自己村里的关帝庙烧香了。她们到后不顾疲劳，趁着庙门还没有开的工夫，在庙前广场的小吃摊上随便吃点东西，庙门一开就赶紧到庙里烧香，烧完之后就可以在庙里看看戏，或者在市场上买点东西，完了按约好的时间再搭乘租的车回去。第三类香客就是专门从很远的地方过来的，如福建、台湾等的信众。这部分人有的是碰巧赶上庙会了，有的是提前向庙里文管所咨询过，正好赶在庙会这天，把当地关帝庙的关老爷抬到庙里，他们称之为“谒祖进香”。这些人的时间安排，据他们讲都是通过占卜的方式由关老爷的神意决定的，什么时间起程，什么时间回程都安排得很紧凑，所以他们进香的速度很快，一般都是进香完毕就离开了，基本上不游览。

其次是当地政府出于带动经济发展和活跃文化的目的而给予的支持与默许。关帝庙归运城市文物局管理，平日作为旅游景点要卖门票，门票由关帝庙文物保管所的工作人员收取。而在四月初八庙会期间，老年人可以买戏票进去。相对来说，一张48元的门票对农民来说太昂贵，故老百姓平时也就不到庙里烧香，都在自己家里烧香（当地居民家里大部分都供有关公像）。

庙会期间迎神出游活动历史悠久，各地都有。如明正德海南《琼台志》：五月十一日，卫所扮装“关王会”游街。清嘉庆《宁夏府志》说：在五月十三日之前一天，“备仪仗迎神，前列社火，周游城中”。道光《万州志》：五月十一日，“军民迎关夫子出游”。同治八年湖南《慈利县志》载：“五月十一日迎关帝仪仗鲜丽，沿街游历。”关帝庙文物保管所为了进一步扩大关帝庙的影响，从2006年开始举办大型的“关帝巡城”活动。第一届是关帝庙文物保管所自己作为举办方，第二届是关帝庙文物保管所和解州镇政府联合举办的，2008年这届是应解州工商界知名人士的要求而举办的。

最后，台湾、澳门、香港、福建等许多海内外关帝信众的虔诚崇拜和大力捐助，为关帝庙会的昌盛形成了推动。

可见，地方民众信仰意识惯制、宗教文化的“大传统”、官方意识形态、外力的推波助澜等方面的原因构成了或明或隐的关系网，相互作用，相互协调，从而使关帝庙会能年年井然有序地运行。当然期间起决定因素的还是古老永恒的民间信仰，正如吕斯托所说：“任何一代人所具有的行为规范和信仰范型主要都不是由这一代人本身建立的。”[4](P49)

三、解州关公信仰的内容

关公从一位历史人物最终成为汉人社会最受崇拜的神灵符号，在中国封建社会改朝换代的进程中，在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荡涤中，逐渐地蜕去了特定历史氛围的表征，注入了传统的文化精神，再披上一些宗教的华衮，从而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文化象征。纵观关公信仰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这个过程是在民众与官方共同建构下完成的，是国家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活动的文化表述。因此，只有将关公信仰这种文化象征符号置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加以考察，才能真正理解其发生原由、存在价值和社会功能。通过调查，当地关公信仰的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祈雨。这是一项关系到民众共同利益的活动，自古以来在当地颇为流行。本地流传关帝是天上的草龙投胎转世在解州的。另一种说法是关帝在天上是管司雨的神灵，因此人们遇到天旱的时候都到关帝庙去祈雨。访谈中许多人说到在关帝庙祈雨的成功率能达到百分之八九十，非常灵验。有时是一个村子，有时是几个村子联合起来进行求雨，最多的时候能达到八个村子。过去每个村子里都有关帝庙，解放以后在各种政治运动中逐渐被拆毁了，现在

这一带只有解州镇和常平村保留了关帝庙,规模大,保存完整。每年祈雨的时候,人们都到解州和常平的关帝庙去。民间祈雨活动,必抬关帝像或神牌游行,祈雨成功,则会演戏酬神,人神共娱。

解州这一带南面背靠中条山,北面临盐池,处在一个狭长地带,以农耕经济为主,人均耕地却很少。每当春夏之季,久旱不雨,庄稼干枯,村民便自发组织起来求雨,而且大部分时候都很灵验,村民都说这是关老爷“显灵”了。

2. 驱瘟疫。古时候民众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缺乏,一旦出现大规模的瘟疫,村民便束手无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神灵身上。过去当地出现瘟疫,人们就抬关帝像巡游,以驱除瘟疫。

如一位被访者所言:

常平这个地方相当闭塞,前面是盐湖,后面是中条山,真正发展起来是90年代以后。当时常平这块有瘟疫,庙里有关公的坐像,从芮城县抬来回报关老爷的。如果哪个村里出现瘟疫了,天旱了,就把那个神像抬着游街。现在成文物了,放到解州关帝庙去了。现在每年的四月初八,抬到解州街上游行,不在村里了。原来曲村好像是民国时候,出现了瘟疫,把这个像抬到哪块转一圈,哪块就好了。这种情况还比较多。^①

3. 求财。据说,奉关帝为“财神”源于宋代,在这之前,商贾们供奉的财神是武财神赵公明和文财神比干。这类的传说众多,关帝的仁义、忠诚成为商家提倡的道义标杆,成为人们行为诚信的样板。所以,继明清时代的商业会馆后,90年代后的商店、宾馆,无不供奉关帝的神像,来显示自家的道德标准与行为诚信。调查中发现当地人,尤其是经商做买卖的,都完全把关帝作为财神,每月的初一、十五都赶到庙里来烧香,平日里则在自己家里。尤其是岁时节日、关老爷生日等重要日子,整个关帝庙人头攒动,香烟缭绕。运城地区的很多汽车里都摆放着关帝的精致小巧的立像,这样做就是祈求关老爷保佑招财和平安的。

另外,在解州当地关公信仰的内容还包括求学、求医、求子、求找物找人等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的精神寄托方式和道德观、价值观是关帝信仰盛行的原因之一。有了关帝庙,民众就有了自己的精神家园。每当有事去求一求,心里就踏实一点,多一份生活的希望。特别是随着大众传播媒介进入民间生活,使他们大开眼界的同时,又深深地感叹世界之大之精彩而自己生活的低下和无奈,所以有些人并

不一定信仰关公,但他们认为有一处精神寄托总比没有强。所以,不论城镇居民还是农村民众,他们对信仰方面的事多是以道德标准来评价的。

四、关公信仰观念的复合性

根据解州镇地方民众对关公信仰的解说,大致可将信仰阶层分为两层:一是以拥有一定教育背景的文化阶层,包括干部、关帝庙的工作人员、商人等。他们中的中老年接受过小学教育,年轻人接受过中等教育乃至高等教育,又长期受到现代文明的熏染和“大传统”文化的教育,所以从书本中获得关于关公的知识并且加以解说,自认为是准确科学的。他们一般不叫“关老爷”,而称“关帝”、“关公”。他们解说的知识来源于当地文化精英们对关帝所做出的解释。当地为了开发关公文化资源,大力提倡关公研究,一批文化精英不但发表了大量介绍关公的文章,而且还办过《关公研究》杂志,出版过《人·神·圣关公》、《武圣关羽》、《关公故里的传说》、《关羽传奇故事》、《关公文化大透视》等书籍,拍过电视剧《关公出世》、《关公热话》,主办过国际性的关公文化交流会,当地河东博物馆举办了“关公文化展”,所有这些活动在当地民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这种很具规模的文化氛围中,市、县的“有文化的”人们逐渐形成了一种地方化、科学化的关公解说的文本。这种解说的话语体系既不同于乡下人的解说,也不同于正统学术用语。这是一种逐渐向学术的“专用语”靠近,以学界专用的话语来更新地方的民间话语的地方上层表达方式。

二是以农民为代表的纯下层民众,还包括少量的解州镇居民。他们对关公的知识基本上是来自祖辈口耳相传的耳实之学。虽然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媒体和当地政府宣传、地方文化精英建构的文本的影响,但他们对关公的解说依然有自己的文本,自己的话语。调查中发现,当地民众更多的时候是把关帝作为一个当地祖先,一个好人,“人”的角色要多过“神”的角色。民众中流传的关帝传说具有自己的特点,如地方化、无限神圣化、演绎合理化等等。这些就是民众自己对关公的解说文本,显然是和当地文化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解州,关公信仰观念的复合性很好地体现在关帝庙的修建上。从历史到现在,关帝庙成为解州当地最大和最令人难忘的建筑,寺庙不断修缮和重

^① 访谈时间:2007年12月8日;访谈地点:常平家庙解签处;访谈对象:赵华根,常平人,男,46岁。

建,所用的木料和石材都是多方社会力量捐资的。这些代表着当地信仰群体集体的力量。正因为关帝庙和关公信仰在当地人的心目中占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才让人们分担兴建时如此巨大的财力和人力资源方面的压力。关羽作为被神化了的历史人物,是作为百姓、政治和军事价值的象征而存在,故而得到官府、地方精英和民众的极大重视。每个信仰群体都把自己对关公信仰的观念融汇到对庙宇的修建中,各自发挥着自己的作用,言说着自己对关公信仰的理解,最终完美地体现在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关帝庙建筑上。而且,解州当地现存的一系列关公祭祀仪式行为中,同样表达了不同信仰群体对关公信仰观念的多重话语和阐释,从而呈现出复合性。

不同的社会群体对关公有不同的信仰诉求,这些群体对关帝这个神灵符号寄予不同的话语和期望,正如同—汉字在不同的诗词中有不同的含义—样,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之下,对关帝的任何特定修正都要从不同地区涵义丰富的文化传统中汲取力量。所以,在不同的地区,关帝的教化作用也是不同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各阶层解释之间没有交叉点,只是各个阶层的解说文本都是按自己的文化观念而作出迥然不同的再解说。而且这两者之间有一个紧密联系和配合的连接点,这就是共同的关帝信仰与地方化情节。而关帝故里的关公信仰又与各地广泛分布的关公信仰有着各种各样的关联。这种不同群体、不同地域之间相互交叉、互相融汇的特点,体现了关公信仰观念的复合性。

综上所述,关公信仰作为中国民间有极大影响

的民俗事象,至今在民众生活中拥有自己的信仰主体并发挥着自己的功能,尽管这种功能中的相当部分是有悖于科学的。关帝庙会及关公信仰是一种广泛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民俗活动,但同时也是一种处在地方文化系统中的信仰民俗,悠久的历史传承、地方性的民众解释、广泛的信仰活动、复杂的当地文化结构不仅是这一社会现象得以兴盛不衰的原因,而且是这一民俗具备地方性特征的基因。因此关帝信仰作为解州当地的标志性民俗文化,虽然与其他地方的关帝信仰在信仰对象、演化过程、传说故事、神圣时间、崇拜方式等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也有许多直接的关系,但它决不是超地方化的,其传承运作只能在地方文化系统中进行。关公信仰与地方社会拥有的其他各方面历史传统文化结成可以“互释”的密切关系,即只有发生“在地化”的关公信仰,才能使关公信仰得以普遍流行。这一观点也可以推广到对于凡能体现统一国家历史的诸多神圣文化现象的研究之中。

参考文献:

- [1] (美)杨庆堃. 中国社会中的宗教[M]. 范丽珠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 [2] 赵世瑜. 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M]. 北京:三联书店,2002.
- [3] (美)明恩溥. 中国乡村生活[M]. 北京:中华书局,2006.
- [4] E·希尔斯. 论传统[M]. 傅铿,吕尔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Guangong Beliefs in the Local Cultural Tradition

YAN Ai-pi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Shanxi 030006, China)

Abstract: Guangong beliefs has important impact on China folk beliefs. It is affected and built by the State and local communities bilaterally in Guandi's home. In the process, Guandi beliefs are explained by local multiple discourse. It reflects the process of interaction and practice between main bodies in society. The vitality of Guandi beliefs passed down in one place has close relationship of mutual explanation for each other, not only for local social life but also for history and traditional cultures that local society has. In other words, Guangong beliefs can be prevalent only if they are localized.

Key words: Guangong beliefs; Haizhou town; local cultural traditions